

# 關山萬里情一家書中的戰時生活 （1937-1945）

王正華

## 摘 要

本文係透過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上王、杜二個家庭於抗日戰爭期間往來的書信，從親族活動見證戰爭下的生活實況。抗日軍興，家庭成員有的留在家鄉的淪陷區，有的奔往大後方，兄弟姊妹輾轉流徙於湘、豫、鄂、滇、黔、川各省，到1944年分別在四川重慶、雲南昆明和貴州貴陽落腳。書信的內容，包括父親對兒女的期望與關注、兄弟姊妹之間的友愛互助，和青年男女在戰火中結緣的戀情，顯示同鄉親族的人際網絡在戰爭中的維繫，他們的命運也和戰爭的發展息息相關。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分四大部分：一、逃難·離散；二、淪陷區下的江陰；三、大後方的萍蹤；四、勝利·歸鄉。試圖從書信中的內容，追尋他們在八年抗戰中的行蹤和經歷，勾勒出淪陷區江陰祝塘的圖像及到大後方的子弟各自經歷的人生歷程。

關鍵詞：汪偽政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清鄉。

## Far Apart But Closer Hearts • The family letters during the Second Sion-Japanese War (1937-1945)

Cheng-hua W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life during the war as found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Wang and the Tu families of a small town in Jiangyin, Jiangsu Province. The members of the two families had gone through great changes, some going to war or the rear hinterland in Szechwan and others remaining at home which was occupied by Japan. They had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 Hunan, Hupei, Yunnan, Kueizou, Szechwan, and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Zongqing, Kunming, or Kueiyang in 1944. Various forms of feelings were found in their letters—the affec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a father to his children, the love and support among brothers and/or sisters, and the love between young couples. It is clearly that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was created in the war time for those diaspora people. Their life was one dictated by the war.

In addition to the preamble and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four major sections: (1) flee and separation: (2) Jiangyin, the occupied area, (3) the life in rear hinterland: (4) victory and go home. This paper tries to follow the tracks, life,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went through the war during the hard times.

**Keywords:** the Regime of Wang Ching-way, the Chungyi Country-saving Army, the New Fourth Army.

---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關山萬里情一家書中的戰時生活 （1937-1945）\*

王正華\*\*

## 前言

這是一個家族的歷史，更是一個家族經歷抗日戰爭的歷史。

日記或書信，這原屬於私領域的記錄，「袒露的正是個人當下的心迹，他們思想的脈動、喜怒哀樂、悲歡愛憎盡在其中，沒有遮掩，沒有虛飾。」這種私人記錄「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也使後人能透過這些私人記錄「靠近歷史」。<sup>1</sup>一般留有「日記」、或「書信」的人物，畢竟引人注意的，都是達官顯貴，學界名流或豪門世家，以他們的日記或書信，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書信的資料，以友人往來者居多，胡適留下書信資料甚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胡適，甚至去探索胡適的感情世界。以私人家書而言，國史館2006年出版《陳誠先生書信集一家書》，豐富的軍事、外交、政治史料，是公開家書史料的重要一例。然一般老百姓的書信，透過他們的書信展現的生活疾苦，歷史家會去關注嗎？他們的書信能反映大時代的脈動嗎？

有別於過去對官方檔案的運用，或對軍政要員的研究，也不同于名

---

\*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關山萬里情一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計畫編號：NSC 95-2411-H-292-001，於「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歷史研究》編輯部、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2007年8月）宣讀。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年9月1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2月31日。

\*\* 國史館纂修

<sup>1</sup> 傅國湧：《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2月，2刷），前言，頁1。

人世家，本文運用民間私藏近七十年，600餘封的家信，嘗試以兩個普通家庭為研究對象，在七七事變爆發後，江蘇省江陰縣祝塘鎮上王、杜二個家庭，透過書信保留二代間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親族活動。這批來自王貽蓀所保留江陰祝塘王家和杜家在抗戰時期的書信，因戰爭造成離散而產生。<sup>2</sup> 戰爭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層面為何？一般老百姓是如何在戰爭中自處？對於國家社會他們的觀感是如何？戰後復員人民對時局的感受又是如何？這批書信實為抗日戰爭親身經歷者的實錄。本文試圖從信件中的內容，追尋他們在八年抗戰中的行蹤和經歷，勾勒出淪陷區江陰祝塘的圖像及到大後方的的子弟各自經歷的人生歷程。

歷史是否只有帝王將相的歷史？看不到一般的平民百姓的面貌。究竟庶民能不能書寫歷史，成為歷史的研究對象？翻閱這批家書，深深感受到民間生命力的展現，是真實的人生寫照，深刻而動人。

## 一、逃難·離散

江陰縣，北臨長江，東與常熟、南與無錫、西與武進為界。祝塘鎮位於江陰東南，永平鄉是夾在祝塘鎮和陸橋鎮之間。<sup>3</sup> 江陰祝塘永平鄉王家，族人聚居「北山頭」和「南山頭」兩村，村後約半里臨西長河，鄉人

<sup>2</sup> 這批書信是筆者父親王貽蓀珍藏，起自1938年至1946年初，一部分是家書200餘封，抗戰時往來於江蘇江陰祝塘、湖南長沙、湖北恩施、廣西桂林、雲南昆明、貴州貴陽和四川重慶等地，經由王貽蓀保存下來，包括其父親王仲卿致他及兄王桐蓀的信，兄王桐蓀、嫂陳偉青和他及妹王芸芳之間的通信，以及岳父杜志春的信。因王桐蓀會將家信轉給弟弟，所以王貽蓀僅能保留這些信件，但王貽蓀寫出的信都未能保留。另一部分是王貽蓀和杜潤枰交往時的通信，從1944年1月開始到1945年9月，雙方共有400多封，是很完整的保留下來。此外，也包括少數親朋好友之間的信件。信件最後由王貽蓀集之於重慶，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帶至南京，1949大陸易色，又從南京遷至臺灣高雄而臺北。轉徙於大江南北之餘，又經渡海，屢次的搬遷，歷七十年後留存下來，實屬不易。

<sup>3</sup> 江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陰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頁69。

稱為「大河頭王家」。王仲卿，畢業於南菁書院，任永平鄉鄉長，家業務農為主兼養蠶為副，有田產10餘畝，1932年在祝塘鎮南石橋開設「王暢茂」糧行，除門售米麥麵粉等糧食外，主要業務為向農民購穀，再碾成白米運銷上海。<sup>4</sup>家有老母在堂，三子二女，長子王桐蓀，<sup>5</sup>妻陳偉青，<sup>6</sup>次子王貽蓀，長女王芸芳，次女王芸芬，三子王穎蓀；抗戰初續娶沈氏，生三女挹芳。

江陰要塞為南京水路之門戶，江面狹窄，水深流急，黃山、君山鎖住江口，東有狼山、福山（常熟）為屏障，是江防重地。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後，日軍為了攻略南京，打通長江航道，從八一四以後就開始轟炸江陰。11月18日，日軍在福山登陸，向江陰邊境進攻，11月27日入江陰，至12月1日淪陷。<sup>7</sup>日本陸軍從東西兩路侵入江陰城，實行燒、殺、搶三光政策，夜間到處火光燭天，居民被慘殺，婦女遭蹂躪，財物被搶劫。<sup>8</sup>

當11日日軍占常熟，王桐蓀（二十四歲）携待產妻子陳偉青（二十八歲）及全家30餘口，乘船避至宜興之長蕩湖邊。道路傳聞日軍包抄南京，對青年人殺戮極慘，陳偉青力促王桐蓀西行，12月15日，時長女鎮平甫生三天，王桐蓀隻身經皖南入湖南。女眷無法遠行，最後只有折返家鄉。王仲卿因任永平鄉長，留在地方維持秩序，迨日軍迫近，

<sup>4</sup> 王桐蓀、王貽蓀：〈仲卿公家傳〉，《王仲卿公紀念集》（1995年），頁5-8。

<sup>5</sup> 王桐蓀，1934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第十二屆畢業，為唐文治學生，先後和劉露茜編註：《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和胡彥邦、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

<sup>6</sup> 陳偉青，江陰陳家橋人，江陰縣立甲科師範畢業，抗戰前任教於江陰澄南小學和無錫中學。

<sup>7</sup> 張翼鴻：〈“八一三”前後江陰戰場聞見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頁10。趙旭：〈抗戰初期國民黨第103師守備江陰要塞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頁3-5。

<sup>8</sup> 〈日寇在江陰的暴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頁41。

方匆匆西撤，先接在石莊任職的王貽蓀（二十歲），<sup>9</sup>再與地方人士輾轉西奔，翌年除夕抵漢口。<sup>10</sup>隨即透過同鄉會和王仲卿三弟王采卿的女兒王月芳（二十三歲）會合，她畢業於江陰護校，3月初，由漢口轉赴河南信陽，加入中國紅十字會第8醫療隊服務。<sup>11</sup>

1938年正月初9日，王仲卿和王貽蓀在漢口分手，轉赴長沙要和長子王桐蓀會合。<sup>12</sup>王桐蓀和父親於長沙暫租宅樓面二間居住，時長沙尚安，各項生意非常熱鬧。<sup>13</sup>

當時軍事委員會第六部和湖北省政府合辦湖北省鄉政幹部人員臨時訓練班，王貽蓀立即前往武昌參加。父親王仲卿對王貽蓀叮囑：

初到客地言語不通，地方情形不熟悉，于辦事進行方面當然困難，汝年輕血氣方剛之時，遇事萬不可操之過激，尤其遠客他鄉，好在汝已服務有年，當已曉一二，加以桐哥又諄諄之言矣！總之，格外留意是耳。<sup>14</sup>

王仲卿和王桐蓀在長沙租屋三月餘，王桐蓀轉赴湘陰找工作，王仲卿接到由家鄉帶至上海發出的信，告知大河頭王家東村新屋三進大房被日軍焚毀，已先行返家的親眷，上有老母，下有甫出生的孫女，一家老小衣食住難以維持，急待他回家主持，王仲卿嘆道：「可惜整齊的一個宅子焚了剩下焦土，到家見了能不傷心」。<sup>15</sup>到4月間，逃難出來的祝塘人十之

<sup>9</sup> 王貽蓀，江陰長涇中學畢業。1936年7月任江陰縣第七區夏五鄉民眾學校教員，1937年9月升任石莊民校校長兼石莊鎮壯丁訓練隊教練員。〈江陰縣教育局訓令〉，第88號（1936年7月25日）；〈江陰縣政府訓令〉，壯字第111號（1937年9月22日）。王貽蓀保留「江陰縣第七區石莊鎮壯丁訓練隊教練員」佩章。

<sup>10</sup> 王桐蓀、王貽蓀：〈仲卿公家傳〉，《王仲卿公紀念集》（1995年），頁9。江陰淪陷時人民逃難的情景，可參閱蘇惠良：〈追記江陰被日寇侵入前五日活動〉，《江陰鄉訊》，第72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2006年1月），第13版；茅黃山：〈往事如烟（摘錄）〉，《江陰鄉訊》，第72期，第13至16版。

<sup>11</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3月初7日）。

<sup>12</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1月12日），這是戰時家信的第一封信。

<sup>13</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1月12日）。

<sup>14</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年3月5日）。

<sup>15</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3月初7日晨）。



八九已返鄉，王仲卿等長子王桐蓀工作有著落後，又等候次子王貽蓀進一步消息，11日自長沙動身返鄉，殷殷叮囑：「家鄉郵局將通，不過檢查甚嚴，以後若寫家信，宜留意不談什麼，對自己祇可稱做生意，好在我們自己知道是耳。」<sup>16</sup> 臨行一再交代未來兄弟二人和堂房王月芳之間要保持密切聯絡，同鄉在外要互相援助，有言：「流亡他鄉若無人救援，真苦不堪言的。」<sup>17</sup>

杜潤枰（十六歲），正就讀無錫綱南中學初二，隨父杜志春、兄杜鑑枰逃難到長沙。<sup>18</sup> 1938年舉家東返，她單獨留在軍政部軍醫署第59後方醫院擔任看護。<sup>19</sup> 一年後的1939年6月，她以護士身分取得軍用差假證，隻身由辰谿前往貴州銅仁，<sup>20</sup> 趕上國立第三中學初中部三年級的插班考。

王仲卿1938年4月20日回到祝塘，「見鄉下住宅、街上店屋均一片焦土，滿目淒涼，實為心痛，平日服用各物又未帶走，盡付一炬，連田中收起之稻亦盡燒去，真所謂吃得著的、住的，概要重新整理起來。」<sup>21</sup> 時王家祝塘鎮上店屋與鄉間居宅，亂中悉被日軍縱火焚去，惟留大河頭小學之校舍二間尚存，<sup>22</sup> 陳偉青與王芸芳等弟妹賴以棲身，「室無什物，食無石之儲，生計維艱，惟有自行種田種菜，維持生活。」<sup>23</sup>

杜志春一家，居祝塘西街，在戰前經營「杜合茂」南北貨行，生意興隆，除興建祖宅三進三間，也在鎮中心地帶營建樓房三間。祝塘淪陷，

<sup>16</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3月15日晨）。

<sup>17</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農曆4月2日晨）。

<sup>18</sup> 杜潤枰保留的「長沙婦孺互助社發難民證」，名字寫成「杜仁平」，1938年5月初1日發，第363號。

<sup>19</sup> 杜潤枰保留的中士看護徽章，1938年，第427號。

<sup>20</sup> 杜潤枰保留「第五十九後方醫院1939年6月10日發給軍用差假證」。

<sup>21</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1月23日晚）。

<sup>22</sup> 1915年永平鄉大河頭國民小學，係由王仲卿創辦，以王家西村老屋作校舍。王桐蓀、王貽蓀：〈仲卿公家傳〉，《王仲卿公紀念集》（1995年），頁7。繆荃孫纂：《江蘇省江陰近事錄（民國9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5月，臺1版），頁100。

<sup>23</sup> 王桐蓀、王貽蓀：〈仲卿公家傳〉，《王仲卿公紀念集》（1995年），頁9-10。

舉家逃難到湖南長沙避難。在局勢稍見平穩後返鄉，僅剩一幢空屋。<sup>24</sup>

當戰火逼臨時，長江沿岸的百姓舉家逃離家鄉，形成成千上萬的難民西遷逃亡潮，但真正能到大後方的，以一個家庭來說，還是其中的少數，畢竟一個二、三十口的大家庭，家業田產完全拋棄不顧，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人迫於無奈，只有返回故里，重整遭日軍蹂躪的家園。年輕的一輩，輾轉流徙於大後方，奔向未知的前程。

## 二、淪陷區下的江陰

江陰淪陷初期，日軍限於城裏活動，先成立維持會，後成立縣公署。<sup>25</sup> 王仲卿在1938年5月的信上寫道：「家鄉近正編造門牌，以後抽丁絕難免之事。」王仲卿決定先重新起建店屋，以後再謀恢復鄉下房屋。<sup>26</sup> 街上店屋花費250元，6月15日開市復業，初期「店中生意甚好，較事變發生前生意加倍以上。」<sup>27</sup> 日本軍占領下初期無錫、江陰市況如何呢？王仲卿寫道：

余近日屢次至錫，為經商不得不去，錫市甚熱鬧，以前工運路冷落，輪停通匯橋，塊沃處以前冷落，今反熱鬧。北大街塘上江陰巷均已重起新屋，築成馬路，老北門改為控江門，直向北大街，氣概軒昂，市面如昔之工運路。余始終未進城，因要行禮，非所願也。<sup>28</sup>

<sup>24</sup> 杜鑑枏、杜鑑玉、杜鑑瑜執筆，王貽蓀、包坤載整理：〈先父志春公傳略〉，《志春公紀念集》（1993年），頁6-7。

<sup>25</sup> 趙煜祥供稿，趙毅懷整理：〈八年抗戰時期江陰縣政治動態幾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頁29。

<sup>26</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閏7月23日）。

<sup>27</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7月8日晚）。店屋先用草蓋，第二年已漏宕不堪，改用瓦蓋，〈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8月28日晚），又費了70元左右。〈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8月28日晚）。

<sup>28</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七月初8日晚）。



因進城要向日軍行禮，王仲卿不願意，甚至不願進城，展現了典型江陰人「忠義之邦」的個性。

戰爭對百姓的生活層面的影響，以婚姻問題而言，江陰淪陷後，「戰區內之婚姻非常簡單，已有配者大都馬馬虎虎領去。」<sup>29</sup> 即已訂有婚約的，雙方同意，就將女方領去，王月芳的姐姐王蕙芳，就在這種情形下嫁了。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談解約，王月芳因到後方工作，和男方談判退婚，最後由王家賠償男方920元解決。<sup>30</sup> 王芸芳（十七歲）也退婚解決，賠償男方300元。<sup>31</sup> 王仲卿在1939年1月續弦，在非常時期，他需要幫手協助復業並照顧一家大小，只是很簡單的當親眷領來，花費約20餘元。<sup>32</sup>

教育問題上，抗戰爆發時王芸芳正讀初中三年級，王芸芬讀祝塘小學六年級，小弟王穎蓀三年級，因為初高中在縣城，江陰淪陷後地方不安靖，王芸芳、王芸芬就輟學在家。<sup>33</sup> 王仲卿表示：「芳、芬讀書，余竟暫停，女兒終為他家之人，識數字可矣！」<sup>34</sup> 王芸芳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高中復學。小弟王穎蓀因在小學，尚能在祝小完成學業，畢業後也就在家中幫忙父親做生意。

淪陷後的江陰情勢複雜，各種地方武裝蜂起，組織抗日游擊隊，打擊日軍。<sup>35</sup> 國民黨方面，有受戴笠指揮的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sup>36</sup> 共產黨

<sup>29</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五月初10日上午）。

<sup>30</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3日）；王月芳原訂親對象係一中醫。

<sup>31</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3日）。

<sup>32</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閏7月23日）；〈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1月23日晚）。

<sup>33</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7月8日晚）。

<sup>34</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7月23日晚）。

<sup>35</sup> 中共江陰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陰人民革命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頁74-78。

<sup>36</sup> 國防部情報局：《忠義救國軍誌》（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6月），頁7、11、14-16。王貽蓀整理：〈方驥齡先生傳略〉，《江陰鄉訊》（臺北市江陰同鄉會），第10期（1989年5月），第2版；陸超：〈抗戰往事—忠救軍在江陰〉，《江陰鄉訊》（臺北市江陰同鄉會），第10期（1989年5月），第3版；王貽蓀：〈郁錫

方面，有江南抗日義勇軍和新四軍。<sup>37</sup> 兩部在江陰地區對抗日軍之餘，有激烈的磨擦。

王仲卿和王芸芳的信，多次向後方的親人訴說家鄉的失序狀態。1938年7月14日，駐無錫日軍150餘人乘4艘方頭鐵殼船至祝塘，布崗宿營，在顏家橋與忠義救國軍發生戰鬥。<sup>38</sup> 王仲卿到祝塘辦事，遇上軍隊，不忍捨去剛開市的店面，而遭毆打，信上記錄這段親身經歷：

於6月15日開市照常復業，生意尚好。但18日即有軍隊到祝（在顏家橋接觸），致市面蕭條。7月初一又到祝辦事，余因店關係不忍捨去，并以甫經整即遭不幸事，心灰已極，故未走，致遭痛打，生死相差一髮，可為更生矣！現右眼週青色已褪，眼角上腫塊仍未平，左手腕傷仍未復原。事後店中各物運鄉下，市上各戶亦均遷移。一星期復業，刻照常，但冷落而已。<sup>39</sup>

日軍占領下的家鄉，土匪蜂起，1938年自農曆9月迄11月，永平鄉已有十餘處劫案，有兩位認識的鄰居被槍傷而亡。<sup>40</sup>

至1939年春，家鄉粗安，4月中，王仲卿領到短期雜糧憑證，負責承領南街雜糧。新穀登場，即兼營稻行舊業，照常代客賣買，生意亦不差。<sup>41</sup> 但生活程度日益高漲，「米價祝地將近80元左右，種田工人半年工價需170至180元，包水每畝20餘元，店員每月薪金30元外加月費2

---

如先生傳略》，《江陰鄉訊》（臺北市江陰同鄉會），第31期（1994年8月），第2版。

<sup>37</sup> 田玄：《鐵軍縱橫—華中抗戰的新四軍》（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96-97。1938年春，中共領導下，京滬沿線和長江沿岸，成立「人民抗日自衛軍」（簡稱「民抗」），後來又在新四軍茅山根據地陳毅的江南指揮部統一領導下改編為「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黃本仁：〈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頁32。

<sup>38</sup> 江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陰市志》，頁95。

<sup>39</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1月23日晚）。

<sup>40</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8年農曆11月19日）。

<sup>41</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8月28日晚）。

元。」<sup>42</sup>

店中生意固好，但時局關係，生意風險亦大，王仲卿不得已到無錫批貨，但地方不靖，3月17日在錫被匪捕去4、5小時，用去300元。<sup>43</sup> 7月13日赴無錫途中，又被匪劫去身上現鈔外，和準備送修的夾金錶乙隻。同船損失甚巨，同行者有30餘石乾蠶（繭）亦被搶去。<sup>44</sup>

歐洲風雲緊急，使家鄉物價高漲，1939年農曆7月米價20元，9月22元，12月到60元，到1940年1月，已達70元；小麥1939年12月的40元到1940年的1月50元。<sup>45</sup> 1939年12月28日，日軍到祝塘住一宵，29日又到，30日仍來，連住三夜，以致生意上，收帳上均大受影響。儘管如此，1939年店中可盈餘千元左右。<sup>46</sup> 是年農產收成甚好，蠶價高，「故農民甚舒服。」<sup>47</sup> 總言，1938至1939年的二年來，經營糧食較南貨更好，「不過真忙極、苦極」。<sup>48</sup> 由於糧食南貨生意及田產收成均好，1940年初王仲卿在店屋的對面造新屋二間一側，工錢木料，連室內裝修，大約費2,000元左右。<sup>49</sup>

進入1940年上半年，王芸芳的信上傳遞的訊息：

家鄉近來時局甚為動蕩，砲聲槍聲不時的頻傳耳中，交通阻止、百姓驚慌，貨物于此之際中更加騰貴，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sup>42</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4月12日（5月7日））。

<sup>43</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4月12日（5月7日））。

<sup>44</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7月23日晚）。

<sup>45</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7月23日晚）；〈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9月25日）；〈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39年12月12日）；〈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3日）。

<sup>46</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17日）。

<sup>47</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9月25日），是年蠶價春季鮮蠶一擔100元左右，秋蠶200元，晚蠶250元。

<sup>48</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3日）。

<sup>49</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1月20日晚）。

幸而農產收穫尚豐，尚可維持。<sup>50</sup>

江陰祝塘日軍和新四軍三路衝突，王芸芳在信上有詳細的描述：

近來四處土匪倒沒有出現，可是又有日軍來擾騷了，在六月初二日，徐巷日軍與新四軍衝突，…這次日軍與新四軍衝突雙方都不曾受損失，但可憐徐巷卻無辜的打死了三人，並受傷了數人，而且還有最可惡的，就是日軍他拉著了衣服穿整齊的女人，他一定說是新四軍的老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將冷水灌了死去活來，又有人家的錢鈔，如被他落眼，就都拿去。在初三，日軍與游擊隊在朱徐巷一帶又衝突起。結果總是百姓受害，故近來常聽到砲聲槍聲。祝塘已通汽車了，日軍的來去更迅速了呀！<sup>51</sup>

1941年農曆1月，祝塘「近來炮聲槍聲不絕的傳入耳中，時局很不安靜，四處有隊伍。」田事請不起工人，半年工錢170元再加上供飯，要300餘元。<sup>52</sup> 2月，王仲卿信上無奈地寫道：

鄉間時在驚惶中過生活，土匪橫行，綁架勒贖數見不鮮，物價騰貴，粒食小民無以為生，長此以往恐造成恐怖之象，淪陷區民渾渾噩噩無所聞問，我等商人惟做生意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好日入而即安睡〉，過一時等一時，過一日是一日，即是安居樂業。<sup>53</sup>

是年3月，王仲卿在無錫遭捕誣拘押，受驚不小。<sup>54</sup> 至6月間，祝市米價最低已在80元以上〈極次米〉，衣料各均較前漲7、8倍甚至10倍以上。<sup>55</sup>

1941年8月初，忠救軍郭墨濤部主力進駐祝塘，新四軍第6師第18旅

<sup>50</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6月24日）。

<sup>51</sup> 〈王芸芳致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7月12日）。

<sup>52</sup> 〈王芸芳致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1月13日）。

<sup>53</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2月12日（3月28日））。

<sup>54</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5月18日（6月12日））。

<sup>55</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5月18日（6月12日））。

在譚震林率領下，駐紮在祝塘以南的北山頭、南山頭之間，兩部在祝塘展開激戰。<sup>56</sup> 國共游擊戰之下，損失的也是老百姓。8月間，從家鄉傳出的消息，祝塘王家給游擊隊燒搶，新造房子被毀，排門器具燒了、貨搶了、錢搜了，損失有6、7千元上下，王仲卿返家後的心血完全付之流水。<sup>57</sup>

1941年7月1日，日本占領軍某集團軍和汪偽政府展開對江南清鄉，藉武力掃蕩長江三角洲的游擊勢力，解除汪偽國民政府的戰爭狀態。<sup>58</sup> 7月至9月，開始第一階段的清鄉，第一期在吳縣、昆山、常熟、太倉四縣部分地區進行；9月到12月，第二期清鄉重點移到無錫、常熟和江陰；1942年2月至6月，第三期清鄉在繼昆山、吳縣、無錫三縣滬寧鐵路以南地區和江陰、武進兩縣部分地區進行。<sup>59</sup>

清鄉的進行，日軍首先進行軍事掃蕩，並在其武力保護下，開入汪偽的政工團，確立治安，建築籬笆，建立封鎖線。政工團繼進行戶口調查，編組保甲，實行聯保切結。<sup>60</sup> 清鄉區周圍設立封鎖網，是逶迤十餘縣的竹籬笆，將淪陷地區分為兩部分，圈子內是清鄉區，圈子外是非清鄉區，並在重要據點構築碉堡，在公路、運河和重要出入口設立檢查所，檢查出入人員和物資。<sup>61</sup>

<sup>56</sup> 中共江陰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陰人民革命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頁139。

<sup>57</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昆明，1941年10月23日）。

<sup>58</sup> 南海喜三：〈清鄉工作的歷史意義〉（1941年8月），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汪的清鄉》（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7月），頁74。

<sup>59</sup> 余子道：〈汪精衛國民政府的“清鄉”運動〉，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頁320-322。

<sup>60</sup> 汪曼雲：〈千里哀鴻說“清鄉”〉，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頁288-289。

<sup>61</sup>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第十三軍的清鄉工作（節錄）〉，余子道、劉其奎、曹振威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清鄉』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頁155-157。汪曼雲：〈千里哀鴻說「清鄉」〉，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頁288。



日汪完成對蘇常太第一期清鄉計畫後，9月組織江陰特別區公署和江陰特別封鎖辦事處，10月1日宣布對澄錫虞清鄉全面開始。<sup>62</sup> 10月10日，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致電汪兆銘：「第二期清鄉區域之江陰與無錫境內二匪業已肅清，治安正在積極建立中。」<sup>63</sup> 然清鄉展開後老百姓的際遇是悲慘的，王芸芳即於此時不幸遭到日軍的拘捕與酷刑，王芸芳記下清鄉的真實景況，也是傷痛的一頁：

是在舊曆八月初八日，X到祝清鄉，所有家家老幼完全趕出，集在一起，聽他們的訓話，…，。因此，平時稍有仇的人，他就隨意的亂敲，X不問三七二十一都拉起來，可憐遭遇艱苦磨難的爸爸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因X他將拉的人，實行他酷虐的刑罰，一般人受不過刑，就胡亂的招人，當這種情勢之下，百姓都嚇的面如灰紙。…。忽聽見說父親回來了，…，連忙趕出去接他，但一見之下，真使我的眼淚忍不住的流下，只見父親面色慘白，有兩人扶了他走，他自己已不能走了，…

現在各鄉鎮正忙的在編保甲，寫門牌，以後他來查多一人不可，少一人亦不可，並且各個人要領清鄉證，到親戚家去也要領證，回家也要領回家證。唉！如真的如此實行，以此類推生活完全得不到一些自由。<sup>64</sup>

1941年11月，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由常熟至江陰視察，向汪兆銘的報告指出：「惟江陰係屬要塞之地，累經征戰，繁榮未復。」<sup>65</sup> 清鄉

<sup>62</sup> 中共江陰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陰人民革命史》，頁144-145。

<sup>63</sup> 「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致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電」（蘇州，1941年10月10日），〈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原司法政部調查局《汪偽資料》），國史館藏，檔號：118-0101-0018-036。

<sup>64</sup> 〈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10月20日）。王芸芳信上日軍以「X」代表

<sup>65</sup> 「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致委員長汪兆銘支澄電」（江陰，1941年11月4日），〈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檔號：118-0101-0018-043；「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致委員長汪兆銘真電」（蘇州，1941年11月11日），〈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檔號：118-0101-0018-049。



的結果，1941年農曆10月至12月從信上記載祝塘物價，各物只漲無減，人民生活日陷於困苦之中。<sup>66</sup> 江陰白粳米的糧價，從1940年3月至11月是從法幣29元漲至58元，1941年12月到129元。<sup>67</sup>

清鄉對百姓的營生造成不利的影響，生意清淡，王仲卿在是年底的信上，透露出如下的情況：

鄉間現在清鄉，生意甚清，今年之損失，今年之生意進益，恐不足矣！在此無可奈何之時，餘亦樂天知命而矣！<sup>68</sup>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汪加強清鄉工作，1942年2月開始第三期對澄武錫地區的清鄉，加派兵力和警力外，構築長達300公里的竹籬笆。<sup>69</sup> 人民的行動受到限制。1941年底在長涇、祝塘強行採辦軍米4萬石，以致農產物價高漲一倍半，日常物資也急劇高漲，人民苦不堪言。1941年徵收田賦稅款100餘萬元（中儲券），超過江陰淪陷至清鄉前歷年徵收數的總和。1942年兩期徵收田賦款850萬元（中儲券），是前一年的8倍。<sup>70</sup>

清鄉開始後，連郵政信件也受到影響，1941年的10月，王芸芳在信上說：「輪船因清鄉問題停已久，信是郵差送的。」<sup>71</sup> 事實上，自江陰淪陷以後，江陰郵政所處環境複雜，江陰郵局本身在城內，受日本控制。城外是游擊區，有國民黨的游擊區，也有新四軍的游擊區。信件遞送全靠人力和民船，郵政人員輾轉繞道，肩挑背負，即便旅途不靖，盜匪橫行，使

<sup>66</sup> 〈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10月20日）；〈王芸芳致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11月20日）；〈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10月望日（12月3日））。

<sup>67</sup> 《江陰市糧食志》編纂辦公室編：《江陰市糧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168。

<sup>68</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1年農曆10月望日（12月3日））。

<sup>69</sup> 「江蘇省封鎖管理處第一次封鎖會議記錄」（1942年2月12日），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汪的清鄉》，479-486。

<sup>70</sup> 中共江陰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陰人民革命史》，頁146。

<sup>71</sup> 〈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10月20日）。

信件依然可通。<sup>72</sup> 信件遺失率很高，能收到者，誠屬可貴。雖然杜志春對祝塘郵政有所微詞：「信雙方遺失得多，且寄總是掛號、航空，鄉間寄上郵票須再加30元之譜，祝地郵局辦事不大優也。<sup>73</sup>」祝塘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能保持郵路的暢通，經半年以上的信件依然最後能送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家鄉的信件更少獲得，1942年3月，陳偉青曾對王貽蓀信上詢問道：「家中自太平洋戰事爆發後，尙未得一音信，不知近況若何？極念。弟處亦有家書否？」<sup>74</sup> 間或有收到家信，10月時王桐蓀告訴王貽蓀有接到家鄉寄出的信，表示家中很好。<sup>75</sup> 至1943年10月，陳偉青的信上提到：「家中已久無信來，大致最近不會互通了。」<sup>76</sup> 由於1943年到1944年來自江陰祝塘王家的信件沒有保留下來，再有的信件已是1945年春。

1942年至1944年間，直接關係到淪陷區人民生活的是汪偽政權下的經濟統制。金融方面，1941年1月中央儲備銀行在南京開業，發行中儲券，剛開始時和法幣等價流通，發行一年餘，開始取締舊法幣，繼停止中儲券和法幣的等價流通，舊法幣對中儲券從開始的77比1，三個月間下降至2比1，貶值幅度極大，造成淪陷區人民人心惶惶，市面動蕩不安。<sup>77</sup> 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曾向汪兆銘報告因新舊法幣不能等價行使，造成「物價之高漲一日數遷，人心惶惑，生活難安」。<sup>78</sup> 再者，物資有米糧、

<sup>72</sup> 魯汝華：〈淪陷時期的江陰郵政通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頁40-42。

<sup>73</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4月2日）。

<sup>74</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2年3月23日）。

<sup>75</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2年10月20日）。

<sup>76</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昆明，1943年10月23日）。

<sup>77</sup>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覆亡〉（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9年6月），頁212-216。

<sup>78</sup> 「清鄉委員會祕書長李士群致南京行政院兼院長汪兆銘迴電」（蘇州，1942年3月24日），〈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檔號：118-0101-0017-0027。

棉業、粉麥、油糧、日用品五種物資統制，可見統制的全面嚴格。<sup>79</sup>

此外，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對人民是場空前浩劫，江蘇太倉等7縣清鄉一年，徵收營業稅額比清鄉前一年，增加10倍以上。<sup>80</sup> 1945年初，王仲卿的信上，提到的稅收更是不一而足：

今年年大歉，而捐款一批去又一批，均以田畝計算，收租田恐所入不敷所出矣。田賦每畝要合2,000元外，平日每天要派軍警供應，以及一切雜支，並要獻軍米等。商業方面，營業稅、所得稅、消費稅、香燭稅、酒稅等等。河道中一里數卡，甚至一地數卡。<sup>81</sup>

二個月後，田賦增為4,000元至5,000元。<sup>82</sup>

苛政加上連年荒年，物價騰貴，人民無以為生，1944年秋的景象：

蘇省物品以金屬高昂，金子60,000，另祝地米6,500元，今庚白蝟甚重，打去四成之左右，人民生計更難也。<sup>83</sup>

到12月時，「米每石26,000元（祝市），魚每斤500元，肉600元，青菜每斤250元，草紙每刀400元，剃頭須200元，僱工等均以米計數矣，言之驚人，開支浩大，農民亦難堪度日。」<sup>84</sup> 三個月的時間，米漲了3倍之高。

1945年春，王芸芳形容家鄉「臭鹹菜都吃盡」的苦境：

家鄉物價昂貴，壹元壹粒面香豆、拾元壹個葶薺，這種價真是第一次聽到，其他概可知矣！…家家臭鹹菜都吃盡，農民苦楚不堪，加之去年大熟（稻米收成）荒年，今年小熟又是失望，又

<sup>79</sup> 程洪：〈汪偽統制經濟述論〉，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頁196-199。

<sup>80</sup>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華、張雲著：《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下卷，頁842。

<sup>81</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4年農曆12月23日（1945年2月5日））。

<sup>82</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2月23日，清明日）。

<sup>83</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4年9月17日）。

<sup>84</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4年農曆12月23日（1945年2月5日））。

有種種苛政，百姓難以爲生。<sup>85</sup>

祝塘鎮的市況是：「物價高無止境，人民生活艱難萬分，實民不聊生，店中生意寥寥，鎮上行人更少也。」無錫金價最高峰每兩漲至135萬元，祝地米6萬元，其他如花衣市稱22萬元、片紗一類240萬元、杜紗類3,400元，油類120元，柴一擔2,400元，洋油類3,500元，黃豆4,200元，小麥3,600元、線布一尺1,200元。<sup>86</sup> 20天之後，金價回跌至84萬元，爲壓平市價，儲蓄銀行在上海出售金證券，定價78萬元，一月可兌現金，但各地物價仍是上漲，祝地米到10萬元，紗乙件300萬元。<sup>87</sup> 江陰白粳米糧價，1945年5月是中儲券15萬元，6月45萬元，到9月是57萬元。<sup>88</sup>

從信上的訊息，江陰祝塘自1940年夏就出現旱象，王仲卿信上說：「但天時亢旱，三月迄今未有大雨，旱象已成，沿塘有機水可救，內地已無想法。」<sup>89</sup> 1941年秋的收成不好，王芸芳曾提到：「今年的收穫，因白稻太多，要少收一石稻一畝。」<sup>90</sup> 1943至1944年連二年的乾旱，農產歉收，加上苛捐雜稅，激成天仙道的民變，到1945年更形擴大，「蘇南天仙道聚衆蜂起，匪禍橫行，里人恐怖不安。」<sup>91</sup> 對天仙道的爲禍鄉裏，杜志春有詳細的記述：

鄉人組織天仙道者，初意名保家保身，又云佛力保家會，再說大刀會，多數打刀搶後云除壞人。在和平方面及游擊隊均要殺之，標語弄得各處多有，且至無錫去打海關，殺去三人等處，弄得城閉一天，後經皇軍掃蕩，捉拿天仙道，捉除十餘人槍決與殺，在無錫亦漸肅清〈未捉者繳刀〉，漫延至常州，據三東亦發

<sup>85</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2月22日〉。

<sup>86</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5月2日）。

<sup>87</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5月23日）。

<sup>88</sup> 《江陰市糧食志》編纂辦公室編：《江陰市糧食志》，頁169。

<sup>89</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0年農曆6月10日）。

<sup>90</sup> 〈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1年10月20日）。

<sup>91</sup> 杜鑑枰、杜鑑玉、杜鑑瑜執筆，王貽蓀、包坤載整理：〈先父志春公傳略〉，《志春公紀念集》（1993年），頁7。

現，真奇觀也！<sup>92</sup>

王仲卿在信中亦記有：

近為環境之迫，發生民眾起抗，即天仙道與游擊隊互相爭殺，死傷特甚，迄今未見平定，反為擴大，…。<sup>93</sup>

這時天仙道為禍地方，杜家剛舉家避天仙道之禍，杜志春收到女兒杜潤枰寄自貴陽的信，「闔家實盼望已久，今得之信如獲至寶。」<sup>94</sup>然「杜合茂」慘遭天仙道搶掠一空，僅以身免。信上書道：

祝鎮大都出外，我家損失奇重，實被鄉間愚農民組織天仙道，其勢激烈，後經我軍政治肅清。為此大概有附近數餘鎮均閉市有旬，…。近日市上排門仍不開齊，全鎮冷落。<sup>95</sup>

杜家經此劫難，從此家道中落，元氣大傷。<sup>96</sup>

江陰自1937年12月淪陷以後，王家和杜家均經自一片瓦礫中重新復業，經日本占領軍的統治，大致上前三年間，因農產尚能豐收，雖地方上有忠義救國軍和新四軍的爭戰，老百姓基本的營生還可維持。1941年汪偽的清鄉，各種苛政，使得民不聊生，加以連年乾旱，天災人禍，到1945年天仙道為亂地方，王家和杜家再遭重傷，勝利的前夕，真正是暗無天日的日子。

### 三、大後方的萍蹤

1938年1月初，王貽蓀在漢口和父親分手後，到武昌參加湖北省鄉政幹部人員臨時訓練班，經一個月短期訓練，分發江陵縣第三區署任鄉政助

<sup>92</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5月23日）。

<sup>93</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2月23日，清明日下午）。

<sup>94</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5月2日）。

<sup>95</sup>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5月23日）。

<sup>96</sup> 杜鑑枰、杜鑑玉、杜鑑瑜執筆，王貽蓀、包坤載整理：〈先父志春公傳略〉，《志春公紀念集》（1993年），頁7。



理員，投入抗戰工作的行列。<sup>97</sup>

當時長沙有江蘇省失業青年登記、教育部專科以上教職員登記，王桐蓀參加技術輔導團教育輔導員的應徵。應考者很多，報名時很嚴格，須有大學師範科畢業及高考教育行政人員合格的資格，考試時亦甚嚴格，初試錄取後，尚須覆以口試及體格檢查。原定受訓為2個月，縮短為1個月實習，1個月教育。<sup>98</sup> 王桐蓀4月2日晨赴長沙女中湖南行政幹部學校受訓，受訓後分發各縣任事，地位大約是督學。<sup>99</sup>

技術輔導團之組織計分農業、經濟、教育、工礦、社會調查、衛生六項，每項由一人負責，王桐蓀參加教育組，派在湘陰，教育輔導將來之工作範圍，即一鄉一保小學校之籌設，教育產款之整理，小學教師之訓練及指導，教材之改進，民識字教育之推行等等。待遇每月生活費30元，外加旅費10元，共40元。王桐蓀描述生活情形為：

此間雖為一等縣，但縣城甚小，約如靖江相似，居民三萬餘（人），其房屋建築遠不如吾蘇各縣也，現住在縣政府起居飲食尚適，惟膳費尚貴，每月6元4角，菜蔬未見高明。三面皆水，一遍漪漣，徜徉河邊，頗可解悶。<sup>100</sup>

1938年9月，王桐蓀從湘陰到白水，得老師馮振信，轉赴桂林國學專修學校（即無錫國專）任教。<sup>101</sup>

1939年秋，陳偉青決心離開家鄉，前往後方和丈夫王桐蓀會合。王仲卿原不准陳偉青西行，因當時滬路上亦難行，不時或被洗劫，他自己去

<sup>97</sup> 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湖北省政府湖北省鄉政幹部人員臨時訓練班證書，男字第353號（1938年1月30日）；〈江陵縣政府訓令〉，智字第735號（1938年2月23日）。

<sup>98</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3月初7日）。

<sup>99</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長沙，1938年4月2日）。

<sup>100</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湘陰，1938年6月2日）。

<sup>101</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高家坊，1938年9月24日）。時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遷至桂林環湖東路十五號。該信上稱得「馮師信」，指馮振，抗戰後，唐文治將無錫國專校務交馮振全權處理，遷校於桂林、北流、穿山與蒙山等地。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年12月），頁110。



無錫批貨就被搶。<sup>102</sup> 9月初9日，因為有同鄉王鶴亭<sup>103</sup> 夫婦結伴同行，陳偉青携一歲半的女兒離開祝塘，到昆明和王桐蓀會合。<sup>104</sup>

陳偉青從祝塘出來，先到上海，原計畫從寧波到株州入桂林，<sup>105</sup> 中途改變由海防到昆明，11月23日接王桐蓀信，南寧失守，新流情況不明，他正焦慮妻子的安全。陳偉青11月19日抵昆明，30日遷到雲南晉寧，任昆華小學教員，這裏有22學級，4,000多同事。<sup>106</sup>

王桐蓀因工作地點桂林近戰區，頗覺不安，學校因種種關係一時未能遷移。在自己艱困的環境下，不忘寄5元法幣給弟弟王貽蓀。<sup>107</sup> 王桐蓀後經桂林轉到雲南玉溪初級農業職學校任教，「利用此際流浪機會，體察社會人情，沐名川，登高山，自謂胸襟稍開。」<sup>108</sup> 並得和妻女會合。1940年3月，雲南玉溪初級農業職學校和省立玉溪中學合併，改為省立玉溪中學附設農業科及簡易師範部。王桐蓀調來玉中普通中學部任教，寄宿城中。陳偉青則任教於希聖小學，待遇稍增，月可得百元。他們的生活情形是：

然教員總是苦生涯，我在此間本學期約可得百五十元，除開支外實所餘無幾，因此間物價實太高也。如牙膏一管售至5元；鞋一雙10餘元、面布一條6元5毛、布一尺起碼2元以至3、4元不等，如此生活程度維持安得不覺困難。<sup>109</sup>

1938年春，武昌南湖成立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蔣中正

<sup>102</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8月28日晚）。

<sup>103</sup> 王鶴亭，先在綦江導進委員會任事，1944年隨測量隊經西北，到新疆，從事水利事業。

<sup>104</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8月28日晚）。

<sup>105</sup> 上海至株州線，由上海經海道至浙江溫州、金華，沿浙贛鐵路線至南昌、株州，是東南各省難民內徙的重要路線。孫豔魁著：《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頁91。

<sup>106</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雲南晉寧，1939年12月）。

<sup>107</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桂林，1939年12月13日）。

<sup>108</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2月17日）。

<sup>109</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3月1日）。

任團長，陳誠兼副團長，桂永清為教育長。武漢會戰時，該團由武昌撤至湖南沅陵，1939年春遷到四川綦江。<sup>110</sup>湖北省政府鄉政助理員於1939年5月撤銷，服務人員分別調入省訓團及保送軍委會戰幹團。王貽蓀在江陵工作年餘，於4月入戰幹團第一團受訓。<sup>111</sup>王桐蓀1939年5月22日接到王貽蓀自綦江來信，得知他以一個月時間，踏經永綏、酉陽等地，謂：「吾弟以三十日之時間，踏完川湘公路二千里，可謂壯游。」<sup>112</sup>然戰幹團到綦江受訓期間，發生綦江慘案，被指控共產黨員者多遭坑殺。<sup>113</sup>王貽蓀在這場紅色風暴中也被波及，綦江陷於一片恐怖中，學員中有共黨嫌疑的，關的關，拷問的拷問，甚至活埋。<sup>114</sup>看到周遭優秀青年枉死，好友被屈打，自己幾陷危境，當時曾將處境向兄長吐訴。王桐蓀在信上鼓勵他：

備悉弟遭誣未白，言之沈痛，可知內心之痛苦甚深也。然以吾心測度，則恐此信到日，弟冤已大白矣。是耶？非耶？吾人行事，祇自問良心無愧，即可對天地而質鬼神，成敗利鈍，橫遭屈抑，均可坦然處之。想弟亦必得父親忍耐大度，負艱任苦美德之遺傳也。吾兄弟自信待人必誠，謀事必忠，即此已足以自慰而告無罪於祖先矣。望弟一本素志，勿以稍受挫折，稍遇艱危，即中心無主也。社會上艱難險苦之事正多，安知非今日之磨練為他日之成功乎。<sup>115</sup>

王桐蓀也提出自己對於共產黨的看法：

共黨之禍國殃民，稍有常識者即能辨之，兄每聞人道及共黨

<sup>110</sup> 周振強：〈四川綦江戰幹團慘案回憶—記抗戰期間一件蔣幫務屠殺愛國青年的罪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合訂本第2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44。

<sup>111</sup> 王貽蓀保留「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通信連學兵」佩章，1939年下期佩用。另據王貽蓀手記資料（1945年12月5日）。

<sup>112</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桂林，1939年6月7日）。

<sup>113</sup> 鄭蘊俠：〈桂永清製造綦江戰幹團慘案真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特工組織（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sup>114</sup> 張治中：〈我與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80年6月），頁16。

<sup>115</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6月15日）。

者，輒疾首蹙額。平日對於共產主義未加研究，自不可妄加批評，然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行爲，爲所深知，皆平生所痛心疾首者也。<sup>116</sup>

1940年1月，時爲軍委會戰幹團第一團通信連學兵的王貽蓀，獲准進入甲級學生隊受訓。<sup>117</sup>11月，王貽蓀自通信訓練班畢業。<sup>118</sup>先後分發至恩施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見習，繼爲六戰區特務第二團代理連指導員。1941年7月起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第四科中尉科員。1943年5月，王貽蓀調重慶新橋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sup>119</sup>

王貽蓀在恩施時，曾得回歸熱（即傷寒），非常嚴重。當時隊上三分之二以上都染病，生無錢買藥醫病，病死甚多，即使家人來信附有錢的，也被收走。一連的人，到晚點名時，人數愈來愈少，最後三個大隊編不成一個連。<sup>120</sup>王仲卿得到消息，憂心萬分：「前聞貽曾病，余甚心痛，病于旅中誰人問聞，其苦可知，時局之使人離散，不知何日可團敘也？」<sup>121</sup>

杜潤枰於1939年隻身來到貴州的銅仁，進入國立第三中學初中部三年級就讀，繼升入女子部高中，流亡學生的生活，完全靠政府貸金維持，1943年考入貴陽醫學院醫科。1944年1月，王貽蓀接到來自家鄉祝塘小學同學杜鑑枰的信，希望他能利用出差的機會到貴陽照看妹妹杜潤枰，時已流亡在外五年，家裏接濟不上，情況「嚴切艱苦」。<sup>122</sup>在重慶的王貽蓀立即去信聯絡杜潤枰，並介紹正在貴陽中央醫院任職的堂姐王月芳就近照顧。

王月芳，1938年3月初由漢口轉赴河南信陽，繼又和同伴轉赴桂林，

<sup>116</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6月15日）。

<sup>117</sup> 王貽蓀於戰幹團通信隊的報告，1940年1月7日。

<sup>118</sup> 〈證明書〉，桂沐字第024539號（1947年3月31日）。前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教育長，現任海軍總司令部代總司令桂永清具名補發之王貽蓀戰幹團第一團畢業證書遺失的證明書。

<sup>119</sup>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令〉。人字第621號（1940年3月1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委令〉，總字第619號（1941年7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任用書〉，軍渝任字第22179號（1943年5月）。

<sup>120</sup> 王貽蓀口述，女王正明筆錄，2007年8月6日。

<sup>121</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2年農曆1月9日）。

<sup>122</sup> 〈杜鑑枰致王貽蓀函〉（江陰祝塘，原信發信時間不詳，應在1943年間）。

1939年9月間在桂林女中險些被炸，所有衣物盡成灰燼，儘以身免；<sup>123</sup> 10月到廣西陽朔衛生院任職，不久隨行同伴他往，正式護士僅她一人，工作忙碌。<sup>124</sup> 王貽蓀和王月芳失去聯絡整整一年，在1940年3月才復聯繫上；6月，王月芳投考「地方衛生行政人員訓練班」，轉赴桂林文昌門外第二防疫醫院。<sup>125</sup> 1941年10月，王月芳來到貴陽，進入中央醫院附屬醫院任職，並和任職公路局的徐敏生結婚。她在信上寫道：

工作方面，自離江陰護校後，從未有如此忙碌，但是為著生活問題，祇好咬著牙齒去幹。<sup>126</sup>

杜潤枰和王月芳在長沙時有一面之緣，杜父志春和王父采卿是至交。杜潤枰在貴大因接濟不上，生活無以為繼，就在這個時候不得不離開學校，流落貴陽，她在信上告訴王貽蓀：「因離校以來，生活頓形窘困，求事安職更為費盡心計，至今仍于飄流不安之情態中，幾欲返鄉，由同學等勸阻。」<sup>127</sup> 這幾年來在外求學，經濟上的困難：

歷年來所受家庭給與之負擔極為微少，雖有鄉親之轉匯款事，從未受相繼不斷之匯劃，三月、半年寄來錢一次是常事，亦不願向人啟齒。<sup>128</sup>

1944年5月，杜潤枰在貴陽考上郵局的乙等業務員，7月7日分發至貴州郵政管理局貴陽南門支局，時為三等三級業務員。杜潤枰和王貽蓀也開始魚雁往返。然自日本對華發動「一號作戰」以來，5月25日洛陽陷落，6月18日長沙失守，西南告急。當時從桂林、衡陽疏散到貴陽的人非常多，不僅造成貴陽物價高漲，房子也是一屋難求。10月初，王貽蓀專程

<sup>123</sup> 〈王桐蓀陳偉青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2月4日）。

<sup>124</sup> 〈王月芳致王貽蓀信〉（陽朔，1940年3月15日）。

<sup>125</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玉溪，1940年6月15日）。

<sup>126</sup> 〈王月芳致王貽蓀信〉（貴陽，1941年12月23日）。

<sup>127</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函〉（貴陽，1944年4月21日）。

<sup>128</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函〉（貴陽，1944年6月18日）。

趕到貴陽，和杜潤枰初次見面，10月15日即在貴陽訂婚。<sup>129</sup>

到了雲南的王桐蓀和陳偉青，1941年下半年，王桐蓀轉任華新商行總務之職，陳偉青生了第二個小孩，10月起在交通部國際無線昆明支臺工作。<sup>130</sup> 1942年2月底，王桐蓀離開華新行，經同鄉的介紹，到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利滇化工廠任職，<sup>131</sup> 工廠在籌備期間，暫時任文書方面職務，待遇尚可。<sup>132</sup> 陳偉青原在國際電臺工作，薪水頗高，隨王桐蓀到宜良縣鳳鳴村，無事可做。靠一個人的薪水要養活一家人是很辛苦的，「現在我們都在鄉下包飯吃，一月每人須五百多（元）呢！那我們二客半，剛正一月的薪水呢！」<sup>133</sup> 當地的生活物價，陳偉青記述如下：

此地生活之高漲驚人，現米公買（賣）（每石）470（元），黑市700元，肉12元一斤，豬油14元，菜要4元一斤，其餘概可想見。<sup>134</sup>

1945年春際，戰爭已見勝利曙光，但雲南宜良地區的生活，因物價的高漲而更見困難。利滇化工廠工務科技術人員薪資5萬元至6萬餘元，王桐蓀文職僅得4萬8千元，而且應該是1944年底的薪水未發，延至是年3月才發，物價相差數倍，故4萬多元在年底只抵得1萬多元，陳偉青抱怨：「真算倒楣不小。」女兒赴開遠讀書，一切須購買，如蚊帳一頂6千元，其他每月伙食須5、6千元。現每月伙食亦劇漲，現每人每月須4、5千元，還是廠方供給，陳偉青嘆道：「如此生活真有點怕人。」<sup>135</sup> 當時

<sup>129</sup> 王貽蘇和杜潤枰於重慶和貴陽之間的通信，詳見另文王正華：〈烽火渝筑情—情書中的戰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戰爭與日常生活（1937-1945）」學術研討會（2005年12月），未刊稿。

<sup>130</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昆明，1941年10月23日）。

<sup>131</sup> 1942年1月，雲南經濟委員會委托張大煜（江陰長涇人）、茅伯笙兩人成立利滇化工廠籌備處，廠址設於宜良縣鳳鳴村，進行褐煤乾餾試驗，1943年正式成立。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雲南省化學工業工業廳編撰：〈化學工業志〉，《雲南省志》，卷28（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頁40。

<sup>132</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昆明，1942年3月4日）。

<sup>133</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2年3月23日）。

<sup>134</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2年3月23日）。

<sup>135</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3月13日）。



物價：

此地豬肉每斤500元（昆明每斤800元，黑市1,000元），雞蛋每個50元，麵粉每斤400元，士林布每尺1,200元，普通紗布每尺亦須600元。<sup>136</sup>

時隔二個月，物價又飛漲。雖然廠方又外發去年紅利30,000多元，再加每月剩餘的，共有整整的10萬元，本來想預備買美金，5月正好添第四個小孩，10萬元一下子就花完了。美國奶粉每罐1萬5千元，買兩罐，就去了3萬元。雞蛋從50元一個漲到90到100元一個，又豬腰子須800元。買一條美國軍用油布毯，又是7,000元。家中平均每天吃的，須2,000元左右，陳偉青謂：「你看吃得起嗎？真是不得了！」<sup>137</sup>到了7月，肉漲到每斤1,500元，四個月漲3倍。

在穿衣方面，陳偉青平時手頭上有點錢，就買些布料，備不時之需，到1945年春，布價上揚，如果不是平時就有準備一些，全家大小的置裝，花費就要上萬元。生活上的拮据節省，王桐蓀信上描述：

我一人負擔大小六口之家，故用錢特別注意。伊自身之衣服、我一部分及小孩全部衣服，均自己縫製；小孩衣料均係舊衣改製，除我的鞋襪有時略須添製，其他均自製或縫補改製。數年來我兩人添製衣服極少，小孩衣料尤極少購進新料。<sup>138</sup>

利滇廠的情況也不順利，「廠中現在也很不景氣，每月要1,500萬元開銷，而出產現在很少了，最近燒去松節油場1座，倒材料庫房1座，損失達千百萬元。」<sup>139</sup>

雲南的天候狀況，盟國對日反攻作戰，在在都影響的營運：

滇中今年多雨，傾盆而來，為數年所未見，此間廠房且因此而傾圮者。…。此間因美軍向前推進，昆明工程停頓，亦影響本

<sup>136</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3月13日）。

<sup>137</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5月31日）。

<sup>138</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7月18日）。

<sup>139</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7月7日）。



廠營業，然亦無重大關係，因現在一方加緊製造民間用品，一方面跟同向前推進也。<sup>140</sup>

1945年7月7日，抗戰爆發第八年，陳偉青記道：「抗戰結束時（實）在不遠，不知明年現在是否將歸故里也？在外真是苦不堪言。」<sup>141</sup>

#### 四、勝利·歸鄉

1945年的元旦，重慶的王貽蓀手書：「勝利在望」，給在貴陽的杜潤枰立為「迎接勝利的新年」<sup>142</sup> 美國於8月6日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9日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蘇聯同時向日本宣戰，王貽蓀急電杜潤枰「抗戰即將勝利」。<sup>143</sup>

勝利的時刻終於到來，8月10日，日本照會盟國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貴陽，杜潤枰記道：

在12時半以後，所有街上充滿爆竹聲，一種歡騰的人聲使人興奮，使人忘去我們已有八年流離的痛苦，我們很快的將家中收拾好，鎖門進城裏去，每個人面上充滿煥發的驕態，都喜悅得什麼似的。滿街國旗飄揚，爆竹味刺激得人更興奮。...<sup>144</sup>

翌日凌晨，杜潤枰信上再記：

昨晚貴陽歡騰的氣象，空前所未有，這每個人內心真實的流露所集成，弄得大小條馬路水泄不通，盟軍在車上，在馬路旁，手中握著酒瓶在狂飲，大家做著高呼的手勢，內心的興奮都叫出了，一群小學生整好隊，唱著「義勇軍進行曲」，整個的城市差不多要鬧翻了。

<sup>140</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7月7日）。

<sup>141</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7月7日）。

<sup>142</sup> 〈王貽蓀書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重慶巴中，1945年1月1日）。

<sup>143</sup> 〈王貽蓀致杜潤枰信〉（重慶，1945年8月9日）。

<sup>144</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信〉（貴陽，1945年8月10日）。

我們在這整晚都沒有安詳的合眼，設想著返家途中的情況，見白髮脫齒的老父，我想一定會抱頭狂歡流淚的。不說別的，像昨天自午後起，我一直感動流出淚來。所以我無法安眠了。<sup>145</sup>

第三天貴陽的情景：

兩日來的狂歡，今天還是有點餘燼未完，街上仍是歡騰熱烈，見報載重慶也有盛大的歡慶，一定有的，你也在中間跳躍吧！這是真樂。<sup>146</sup>

重慶的歡騰更可想見：

自9日宣布日本投降以來，重慶已入狂歡狀態，勝利已到，凱旋之期不遠，屆時攜手榮歸，樂也奚如！<sup>147</sup>

8月14日，日本正式接受盟國無條件投降傳到重慶，王貽蓀記下這歷史的一刻：

剛剛購號外，知道日本已正式接受盟國無條件投降，祇靜待我們盟國正式公告了。重慶的他鄉之客，紛紛以還鄉與復員談話中心，人們是狂歡中迎接勝利。<sup>148</sup>

王貽蓀當即準備雙十國慶在重慶和杜潤枰結婚，也在這同時接到發於2月5日來自祝塘的家信，這是睽違半年之久的「萬金家書」<sup>149</sup>，王、杜兩家接到他們訂婚的照片，萬分高興，並囑咐早日成婚。<sup>150</sup>當年的中秋節（國曆9月20日），王貽蓀和杜潤枰在重慶七星崗江蘇同鄉會舉行結婚典禮。

淪陷區江陰祝塘的景況又是如何呢？王芸芳8月8日接到陳偉青4月10

<sup>145</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信〉（貴陽，1945年8月11日晨）。

<sup>146</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信〉（貴陽，1945年8月12日）。

<sup>147</sup> 〈王貽蓀致杜潤枰信〉（重慶，1945年8月13日）。

<sup>148</sup> 〈王貽蓀致杜潤枰信〉（重慶中央團部，接讀號外日本已正式接受無條件投降之一小時後，1945年8月14日）。

<sup>149</sup> 〈杜潤枰致王貽蓀信〉（貴陽，1945年8月20日）。

<sup>150</sup> 〈王貽蓀致杜潤枰信〉（重慶中央團部，接讀號外日本已正式接受無條件投降之一小時後，1945年8月14日）。

日信，告知：「和平有望，今年或可返家。」已然接到大後方的訊息，13日勝利傳開，她述說：

在8月13日突傳來一好資訊說和平實現，眾聞悉之下驚喜欲狂，八年的黑暗生活，可能重見光明矣！歡呼聲鞭炮聲不絕于耳，現各鎮也無X人了，但政府一日不至淪陷區，仍一日不得安寧，因派別不可勝數，各據一方，常常衝突，今日至錫的交通阻斷。<sup>151</sup>

從信上的內容可知，日軍已經退走，但地方勢力紛雜，仍處於無政府狀態，更嚴重的是金融的失序。汪偽所發中儲券失去信用，造成物價的劇烈震盪：

現市上米無不售70萬元，小麥20萬元，米最高至140萬元，小麥最高60萬元，糖每斤2萬元最高6萬元，鹽每斤1,200元最高2,000元，肉每斤6,000元最高16,000元，如此各物都跌下數倍。赤金每兩440萬元，最高8、9百萬元。前數日寫信給桐哥，適在最高峰，其原因始則謠儲蓄票失其效用，以致搖動驟劇，各物俱漲，最後發表云儲蓄票有充足的基本金，以致人心安定，各物狂跌。一般小販者大受其影響。<sup>152</sup>

勝利接收，淪陷區人民引頸翹盼，關切民生的中儲券問題，政府處理緩慢與失當，造成失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是在受降之初，規定政府機關暨國營事業以及一切款收支，自政府所派人員接收後，即應完全使用法幣，不得再用偽鈔。9月27日，財政部公布「偽中央儲蓄銀行鈔票收換辦法」，規定中儲券200元兌換法幣1元。自1945年11月1日起至1946年3月31日止為收換期間。在此一收換辦法公布以前的一個月真空期間，由於缺少法定兌換比率，漫無標準，引起金融的混亂。<sup>153</sup> 王仲卿在信上詳

<sup>151</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8月26日）。

<sup>152</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8月26日）。

<sup>153</sup>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覆亡〉（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6月），頁218。邵毓麟：《勝利前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

記這段切身的感受：

近物價因幣制之動定不一，故時漲時落，…，粗布每尺1萬元以上，肉每斤16,000元，米每石80萬元。…。10元、5元早已不能通用，百元票亦歡迎。和平後幣制之謠說很多，有1元法幣換新幣200元者，為正當一些，有240-250元換法幣1元者，甚至謠說以三、四百至千元不一定，故人心不安。且廣州有停止使用之，報上刊告今財部有通告：自11月1日起至明年3月30日止收換之令。即物價稍回，人心稍定，總之200元換1元，人民已大受損失，要知小民經濟有限，如何受得起如此折扣。<sup>154</sup>

江陰祝塘在一個月之後9月，情況有趨緩：

近來時局平靜，各物也下趨了，米每石50萬元，小麥20萬元，新穀登場每石12萬元，油每斤1萬元，肉每斤6,000元，各物都低下數倍，如此人民生活日進佳境了。<sup>155</sup>

但到了10月，祝塘市上仍流通中儲券，物價剛下跌一月，即行高漲：

市上仍流通偽幣，老幣希少，近來各物狂漲，尤其以紗布為最，普通線布須4、5萬元，棉花5、6萬元壹斤，稻每石30萬元。市上仍流通偽幣，老幣希少，比率1,200，關金比率14,000，故幣紙複雜，弄得頭昏，極易算差。<sup>156</sup>

法幣和中儲券的兌換問題，從郵票上可以反映。王芸芳10月的信也勾勒出戰後的社會現象：

我們寄封信偽幣壹萬多元，老幣七、八十元。家鄉的物價也幾度的高跌，亦有那些發國難財的，自和平空氣實現，物價狂跌弄得走頭無路，亦有自殺不少，有的倒閉。<sup>157</sup>

月)，頁83-85。

<sup>154</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8月23日（9月28日））。

<sup>155</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5年9月10日）。

<sup>156</sup> 〈王芸芳致王貽蓀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10月19日）。

<sup>157</sup> 〈王芸芳致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5年10月19日）。

淪陷區的人民在經汪偽政府轄下，先後經過法幣與中儲券兩次兌換，造成的損失相當可觀，更引起金融秩序動盪不安，直接影響政府的戰後接收復員工作。<sup>158</sup>

日軍撤走後的兩個月間地方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新四軍和國軍的動向，9月間，「祝地治安尚好，惜由祝至歸途中，尚有新四軍之查檢耳！」<sup>159</sup>直到10月國軍孫元良部到無錫，地方稍安，「家鄉和平後尚安，但祝至錫在八士橋、張○橋等，有新四軍檢查行人船隻，須捐稅等不安耳。近國軍已到錫（孫元良將軍），已稍安靖。」惟令人遺憾的，江陰縣長包漢生亦即忠救軍負責人，「在和平前一日死於日軍槍下」。<sup>160</sup>

江陰祝塘自淪陷日本，百姓在鐵蹄下忍辱渡日，勝利之初，百姓欣喜之情，記錄在王仲卿的信上：「鄉間自和平後，民衆欣喜非常，八年沉悶，一旦天日重見，莫不雀躍！此次雙十國慶，無錫相當熱鬧。」<sup>161</sup>但自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歷險數次，一方面欣慶王貽蓀和杜潤枰得於勝利後成婚，一方面也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余自事變後在此八年中，歷受日人之侮辱，及其他之苦累，一言難盡。」<sup>162</sup>

勝利固然令人興奮，但緊接而來的復員問題，而西南大後方為抗日備戰的生產事業，也面臨嚴竣的挑戰，利瀆廠的情形即是一例：

戰事結束以來，投降問題頗令人沈悶，實覺進展太遲也。而最近物價大跌，所發生之影響殊為惡劣。目下昆市附近工廠能維持者十不得一，非但製成品之成本須虧蝕，且進而製成品雖跌價不已，而無一顧主問訊。試想此每月千百萬（元）開支之工廠，將以何法維持；此間於旬日前即裁減工人數十名，下月份恐工人

<sup>158</sup>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覆亡〉，頁219。

<sup>159</sup>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8月23日（9月28日））。

<sup>160</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9月15日（10月20日））。江陰光復後，即由包漢生部下方驥齡繼任江陰縣長。

<sup>161</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9月8日（10月3日），10月13日發）。

<sup>162</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杜潤枰信〉（江陰祝塘，1945年農曆9月15日（10月20日））。

須再裁百名，職員亦須減去十數也。<sup>163</sup>

到了9月，情況更嚴重了：

廠中現裁去工人三分之二，職員也大都離去了三分之一，但薪津9月份聞減去所有的一半。據已經離職的講，倘我們走的話，當然也可以得到20萬（元）的旅費的，所以回家的旅費可以有一點著落，據報載滇越公路已著手修理。總之，以我們人多、行李多，也除了打海防走，無法可想，所以我們只有靜待海防的路暢通才得回家，比較經濟又舒適。

我們在半月前把所有的東西拍賣了些，但因昆市物價跌，所以也賣不起價來。<sup>164</sup>

1945年利滇化工廠務最興旺時，職員50餘人，工人300餘人。1945年抗戰勝利後，職員多數返回沿海省份，業務衰落，僅有職員15人，工人49人。<sup>165</sup>

王桐蓀和陳偉青此時一家六口，最小的在襁褓中，遲至1945年11月22日啟程返鄉，18日先到昆明，再由沾益搭汽車直於衡陽轉漢口。<sup>166</sup>同行40多人，分、大小車，一路上極熱鬧。<sup>167</sup>王桐蓀本擬赴貴陽看望王月芳，但未能成行，「一則行旅困難，二則經濟不允也，再則一年前汽車來往筑渝，蓋如家常便飯，現則公路上已零落冷清，無復往日光景矣！」<sup>168</sup>

王桐蓀一行於12月30日搭小火輪離漢口。1946年1月5日深夜抵蕪湖，6日晨搭火車至南京，當晚再搭夜快車於7日清晨3時到無錫，8日在錫晤父親，八年的別離，歷經多次磨難，他告訴尚在重慶的弟弟：「容顏

<sup>163</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昆明，1945年8月29日）。

<sup>164</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9月21日）。

<sup>165</sup>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雲南省化學工業工業廳編撰：〈化學工業志〉，《雲南省志》，卷28（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頁40。

<sup>166</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宜良鳳鳴村，1945年11月16日）。

<sup>167</sup> 〈陳偉青致王貽蓀杜潤枰信〉（昆明，1945年11月19日）。

<sup>168</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1945年12月12日）。



依然，殊為欣慰。」可告慰的，攜回孫兒增加了三個。「此行大小均安，行李亦毫未遺失，甚為可喜。」<sup>169</sup> 也算幸事。

1946年1月，王桐蓀返回祝塘老家，會舊友，他的心情寫照：

返祝後至大河頭二次，非復昔時景況，不勝感慨。…祝塘熟人均已晤及，昔日少年輩現在相見，兒女成行矣。<sup>170</sup>

祝塘經八年戰火的摧殘，江水依舊，景物全非，戰火餘生下，對於前途，可嘆勝利沒有帶來希望的願景，國共戰火的煙硝，百姓對於將來是未卜的迷惘：

此次在澄住三晚，主要目的係訪晤友朋，一游舊地，結果三日中至南菁、輔延等地，但見一片瓦礫，登君山，但見破廟頹垣，一片淒涼景色，街上商業凋零，燹後屋宇均未修葺。回憶昔年盛時，不勝感慨係之。友朋晤見者亦不少，大抵八年苦鬥，僅留得殘生，苦難雖過，前途未卜，與後方歸來者亦大異其趣。<sup>171</sup>

## 結 論

翻開這批泛黃的書信，一頁頁書寫的是從1938年1月至1946年1月，江陰祝塘王家和杜家兩家人在對日抗戰的戰火下，經歷離散到團圓的點點滴滴，以及周遭所發生的所見所聞，為當時代留下真實的記錄。

1939年4月，王仲卿返回江陰祝塘，基本上是十天就有一封給在外兒子的家信，但遺失很多。由於淪陷區信件檢查很嚴，故信上避談政治，以生意人自居，也因此往返的信件內容，都記有當時生活物價的變動。「接汝來函快慰莫名，因汝已好久未有來信寄回，屈指半年矣！日夜盼望，好不容易得到，實在道途太遠了。」<sup>172</sup> 道盡一位父親對遠行兒子懸念，這

<sup>169</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上海，1946年1月10日）。

<sup>170</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6年1月20日）。

<sup>171</sup>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46年1月27日）。

<sup>172</sup>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江陰祝塘，1939年農曆7月23日晚）。

也是離亂時代太多人家共通的寫照。

透過王仲卿、王芸芳、杜志春的信件，揭開日軍占領下淪陷區的真相，無政府狀態下，百姓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在恐怖中渡日。忠義救國軍和新四軍都抗日，但地方上相互的纏鬥，苦的還是百姓。日汪清鄉後的實況，帶給人民的痛苦除了行動的限制，肉體的摧殘，苛捐雜稅的剝削，物價高漲，所謂「民不聊生」，是他們親身經歷的。天旱人禍，終於激成1945年天仙道民變。1938年當王仲卿、杜志春逃難返回家鄉時，房舍已成廢墟，家毀了重建，看到的是強韌生命力的展現。其後王家又遭游擊隊燒搶，最後在天仙道之亂杜家受到重創。戰爭帶給百姓的創痛，真是無語問蒼天。

王桐蓀1938年先至湖南湘陰任職，復轉廣西桂林任教，陳偉青1939年9月攜幼女從淪陷區來到雲南昆明，夫妻1940年春在昆明會合，王桐蓀到利滇化工廠任職後，總算安頓下來，到1945年，共生了三個男孩。沉重的負擔，使他們不斷地換工作，就是希望能謀得較多的薪水，改善生活。後方生活的艱辛，陳偉青不到四十歲的年紀，頭髮已經半白。勝利後的西南已見蕭條，其後一家六口輾轉歸鄉，但見故土殘破，舊友「僅留得殘生」。

王貽蓀1938年投效軍旅，經湖南江陵、四川綦江、湖北恩施，到四川重慶任職。王月芳一直在醫界服務，1938年經河南信陽，廣西桂林、陽朔，最後到貴州貴陽，結婚生子，落籍於此。杜潤枰從湖南長沙到貴州銅仁升學，1944年1月在貴陽和王貽蓀通信結識，10月在貴陽訂婚。時逢日軍在西南最後的攻擊，貴陽危在旦夕，杜潤枰每日在防空洞內覽讀王貽蓀的情書，帶給她支持的力量。1945年勝利的歡樂，在貴陽和重慶的信間留下珍貴的記實，杜潤枰奔赴重慶，於中秋節和王貽蓀完婚。在祝塘的王家和杜家，同慶他們的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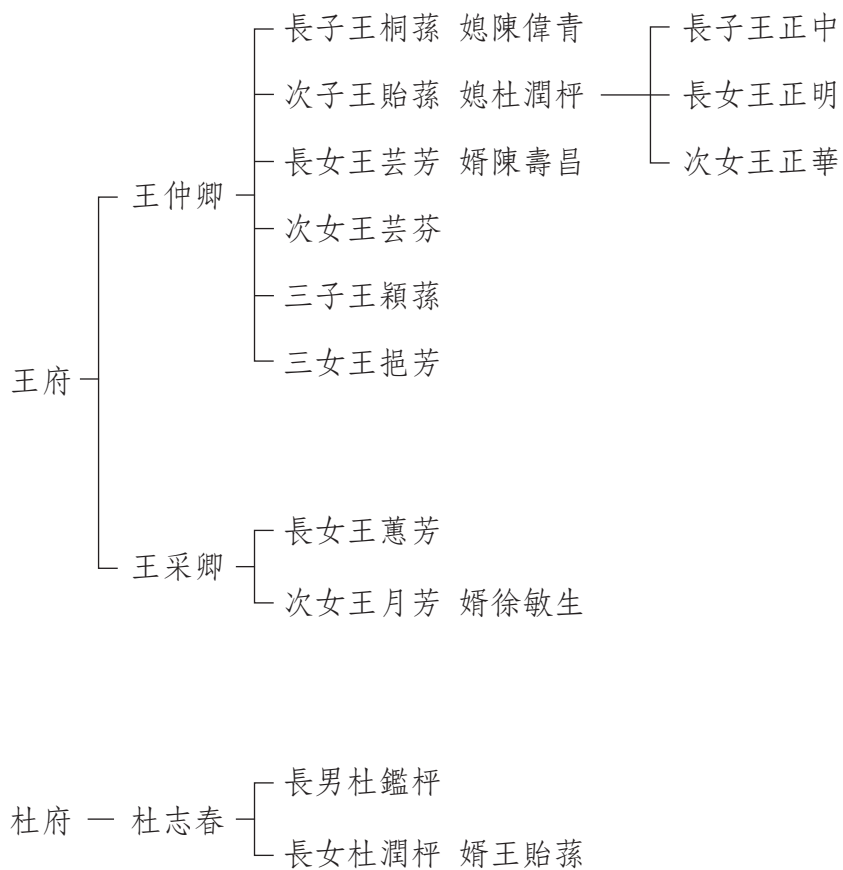
比起抗戰八年的分離，兩岸睽隔三十年後，1976年6月，王仲卿（時八十五歲）親筆給在臺灣王貽蓀、杜潤枰、王芸芳、陳壽昌子媳女婿四人

的信上，告知家鄉的情形，「因南石橋改建，開大河面」，大河頭王家實已不復存在。<sup>173</sup>七十年的歲月流轉，政權興替，物換星移，大河頭王家和祝塘杜家的子孫，第二代暨第三代都移到無錫、上海、北京，甚至更遠的地方發展，現在的祝塘人民，可能無人知道王家、杜家，更不會去關心祝塘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曾經經歷過的種種，一切隨風而逝。有幸透過這批書信，一方面為親歷這場抗日戰爭的長輩，七十年後現在已是風燭殘年，為他們走過的歲月留下大時代的印記；一方面也為後世留存曾經在祝塘有王姓、杜姓人家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留下的浮光片影。

---

<sup>173</sup> 王桐蓀、王貽蓀：〈仲卿公家傳〉，《王仲卿公紀念集》（1995年）收錄。

## 王杜兩家婚姻世系簡表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汪兆銘史料》（原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汪偽資料》）（臺北，國史館藏）

118-0101-0017〈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一）〉。

118-0101-0018，〈民國三十一年各方為清鄉工作致汪兆銘之函電（二）〉。

王貽蓀藏王府、杜府信件

王仲卿致王桐蓀信

王仲卿致王桐蓀、陳偉青信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

王仲卿致王貽蓀、杜潤枰信

王桐蓀致王貽蓀信

陳偉青致王貽蓀信

陳偉青致王貽蓀、杜潤枰信

王芸芳致王桐蓀、陳偉青信

王芸芳致陳偉青信

王芸芳致王貽蓀信

王芸芳致王貽蓀、杜潤枰信

王月芳致王貽蓀信

杜志春致杜潤枰信

杜鑑枰致王貽蓀信

王貽蓀致杜潤枰信

杜潤枰致王貽蓀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任用書〉，軍渝任字第22179號  
（1943年5月）。

〈江陰縣教育局訓令〉，第88號（1936年7月25日）。



- 〈江陰縣政府訓令〉，壯字第111號（1937年9月22日）。
- 〈江陵縣政府訓令〉，智字第735號（1938年2月23日）。
- 〈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湖北省政府湖北省鄉政幹部人員臨時訓練班證書〉，男字第353號（1938年1月30日）
-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令〉，人字第621號（1940年3月1日）。
-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委令〉，總字第619號（1941年7月1日）
- 〈證明書〉，桂沐字第024539號，1947年3月31日。
- 王貽蓀「江陰縣第七區石莊鎮壯丁訓練隊教練員」佩章。
- 王貽蘇「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通信連學兵」1939年下期佩章。
- 王貽蓀於戰幹團通信隊的報告，1940年1月7日。
- 杜潤枰「長沙婦孺互助社發難民證」，1938年5月初1日發，字第363號。
- 杜潤枰中士看護佩章，1938年，第427號。
- 杜潤枰「第五十九後方醫院1939年6月10日發給軍用差假證」。
-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汪的清鄉》。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7月。
- 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
- 余子道、劉其奎、曹振威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清鄉』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特工組織（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 （二）專書

- 中共江陰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江陰人民革命史》。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
- 田玄：《鐵軍縱橫—華中抗戰的新四軍》。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
-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華、張雲：《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 邵毓麟：《勝利前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9月。
- 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
- 國防部情報局：《忠義救國軍誌》。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6月。
- 傅國湧：《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2月。
- 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

### （三）文集紀念集

- 《王仲卿公紀念集》，自印，1995年。
- 《志春公紀念集》，自印，1993年。
- 王桐蓀、胡彥邦、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
- 王桐蓀、劉露茜編註：《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 （四）地方志書

- 繆荃孫纂：《江蘇省江陰近事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5月。  
（民國九年刊本影印）
- 江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陰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江陰市糧食志》編纂辦公室編：《江陰市糧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雲南省化學工業工業廳編撰：〈化學工業志〉，《雲南省志》，卷28。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 （五）期刊論文

〈日寇在江陰的暴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

王正華：〈烽火渝筑情—情書中的戰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戰爭與日常生活（1937-1945）學術研討會」（2005年12月），未刊稿。

王貽蓀：〈郁錫如先生傳略〉，《江陰鄉訊》，第31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1994年8月）。

王貽蓀整理：〈方驥齡先生傳略〉，《江陰鄉訊》，第10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1989年5月）。

周振強：〈四川綦江戰幹團慘案回憶—記抗戰期間一件蔣幫務屠殺愛國青年的罪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合訂本第2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邵銘煌：〈汪偽政權之建立及覆亡〉，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9年6月。

茅黃山：〈往事如烟（摘錄）〉，《江陰鄉訊》，第72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2006年1月）。

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年12月。

張治中：〈我與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80年6月。

- 張翼鴻：〈「八一三」前後江陰戰場聞見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
- 陸超：〈抗戰往事—忠救軍在江陰〉，《江陰鄉訊》，第10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1989年5月）。
- 黃本仁：〈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8月。
- 趙旭：〈抗戰初期國民黨第103師守備江陰要塞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
- 趙煜祥供稿、趙毅懷整理：〈八年抗戰時期江陰縣政治動態幾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
- 魯汝華：〈淪陷時期的江陰郵政通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7輯，1986年10月。
- 蘇惠良：〈追記江陰被日寇侵入前五日活動〉，《江陰鄉訊》，第72期（臺北：臺北市江陰同鄉會，2006年1月）。

昭示更覽 願指 三月未見 來信 愈何如也  
 十月接由 浣陵 來信 歷正月 芳全日 六月二十  
 云入校 求學 未知 何種 學校 近及 如何 尚未 敘述  
 桐年 六月 後未 見來 信之 否 家中 每隔 十天 說有  
 一信 寄汝 等信 之未 見後 信寄 來 到 下 家 鄉 尚  
 安 但土 匪 肆 自 九月 迄今 我 永年 已有 十餘 雷 劫 案  
 矣 李村 令 王金 根 均 被 槍 傷 而 亡 店 中 生 意 尚 好 勿  
 念 桐 村 有 信 世 居 以 必 宜 勤 苦 家 信  
 公 啟  
 十月九  
 二〇一九

王仲卿致王貽蓀信



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利濕化工廠

字第 號第 頁

34-3-8000

三一四一：號掛帳

三十四年七月又日

天

弟為修滇中今年多雨，傾盆而來，為數年  
 所未見，此間廠房具有因此而傾圮者，聞偷  
 布虎瘦，統行蔓延頗多，亦所詭矣，災人禍  
 也，近況如何？久未得悉，為念，爾梓隸法，測  
 事何至今未見消息？宗中無信息，令人心  
 想此間因美軍向前推進，昆明工程停頓，亦影  
 響青本廠若業，然亦無恙，若何重大關係，因現在  
 一方面加緊製造民間用品，一方面跟同向前推進，弟  
 等弟前亦轉道，復對部之訊，現在如何，弟  
 思，信現在何處，近狀如何

兄 桐 孫 啟

王桐孫致王貽蓀信

貽孫胞兄。忽接手書，欽慰之至。一切僅尊兄命為是，自不幸遭  
 此國難，使一家人流離失所，各奔東西，實為可傷，但未知何年月  
 日才是我們歡聚之期耳。我同芳二人是在從前做校舍的處  
 裡，親弟在視小學校，他已久未下鄉，未知他成績如何，想他告知你  
 必但他仍是喜學怕學，但他有一種特性，對於商業方面，喜很喜，  
 學諳兄知之屬甚喜。<sup>芳妹</sup> 在家至今終於一學所成，甚為可恨。  
 家鄉近來時局甚為震動，炮火鎗聲不絕，平傳耳中，交通阻  
 百姓驚惶，貨物於之際中，更加騰貴，入民生活更加困苦，俾而農  
 產收穫尚豐，尚可維持田中的糧已長的很長了，天不晴的，下雨故農  
 夫不受灌溉之苦，家中自 父親大人以下，都很安吉，在中 生意興  
 隆，村上小學有相祝華二叔辦理，雪叔於華巷小學，<sup>芳芳姊</sup>  
 產一四孩，果門二婦，亦產一男孩，地今共三女二男，余孫弟下學  
 期入五年級，文錯誤之處，請兄指示，專此敬請。

夏忠

胞妹 芳芳謹上

陰曆六月廿四日

王芳致王貽孫信